

红一方面军

费佩如 编著

长征日志

The Dairy of
First Front Red Army
over Long Marc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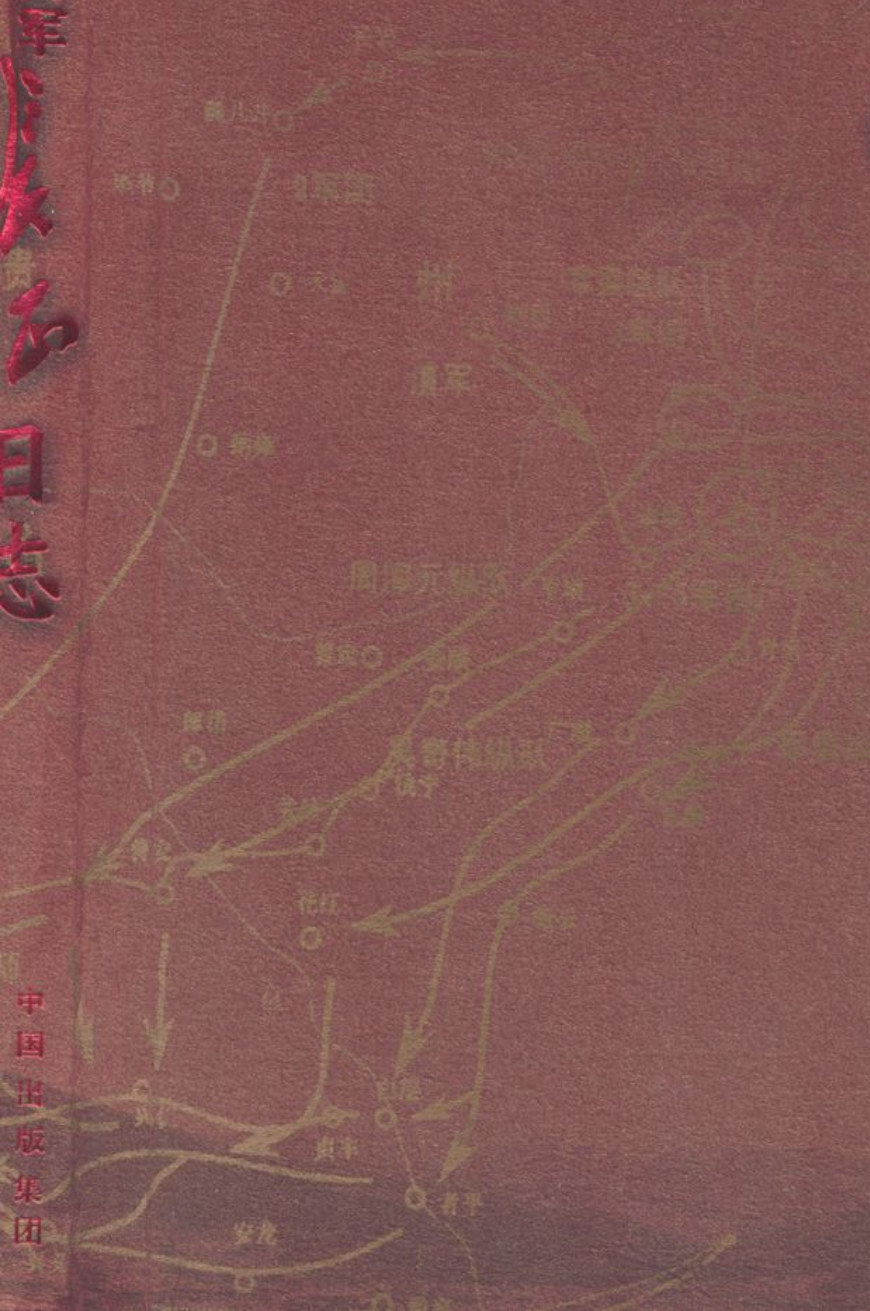
The Dairy of
First Front Red Army

红一方面军

长征日志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The Dairy of
First Front Red Army
over Long March

红
一
方
面
军

长
征
日
志

费侃如
编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序

聂震宁

历史已经证明，7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的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翻开了中国革命新的一页，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前途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历史并将不断证明，红军在长征中所表现出来的精神，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鼓舞中国人民奋勇前进。长征是中华儿女永久的骄傲和记忆。长征有着永远说不完的故事。1937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延安曾经写下这样的预言：“总有一天，会有人为这次激动人心的远征写出一部完整的史诗。”最早的一部长征回忆录，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直接指导下，从“长征亲历记”200多篇征稿中精选出100篇编辑而成。作者多是亲历长征的红军中、高级将领。定稿时书名为《二万五千里》，1942年以《红军长征记》由八路军总政治部正式出版。70年来，国内外的作家、记者、史学工作者和长征亲历者，从未间断过著书立说，回忆、研究、描写、讴歌这一“震动世界的

行军”。伟大的长征值得人们永远地纪念和颂扬。

在众多长征题材的书籍中,《红一方面军长征日志》是一部独具特色的著述。此书以日志的形式,记录了红一方面军各军团在长征中经历的大小战斗及所遇到的艰难险阻;记录了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那非常岁月里,呕心沥血、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的各项决策;记录了“中华民族的脊梁”们坚定不移的革命精神和必胜信念。日志所载,均有所据,历史事实与文献资料、研究成果融为一体,不仅准确,而且真切,不仅生动,而且自然。书中真切记载着长征二万五千里的血与火、云和月,似亲历者所记,却是一位后来的历史研究者的考证所得。而正因为是一位后来者对长征的考察、研究和描述,我们又能感受到长征精神对于这一学术研究壮举的鼓舞和召唤。红军长征,路程最远者二万五千里,历时最长者达一年之久,漫漫险途,山重水复,军情紧急,生死搏杀,红一、红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甚至没有留下一张照片,留下的文献档案也极少,更没留下一部完备的日志记录。后来人要编制一部历时一年的日志,可以称得上是个人学术研究的一次万里长征,要想完成好这一学术研究的长征,同样需要研究者发扬长征的精神。

完成这一学术研究长征的战士是费侃如同志。他是遵义会议纪念馆的研究员,每天近距离凝视长征途中的如海苍山、如血残阳,耳畔时时回响红军队伍的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长征的精神鼓舞他,红军的业绩召唤他,于是,30多年前,他产生了为红军长征编写日志的冲动。为了这一崇高的冲动,30多年来,费侃如苦心孤诣,探索隐,搜集史料,考订真伪,准确记述,奉献了人生最好的年华,水滴石穿,书稿既成,青丝已成华发。1999年著作首次出

版，立即得到军史界、党史界较高的评价，获得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费侃如并未就此止步，他的考证工作一直在坚韧不拔地进行。今年初，我看到费侃如在1999年版的书中，加写了密密麻麻的文字。7年来，关于长征研究的新成果，举凡与此书内容相关，尽收他的眼底。在此基础上，他仔细剔抉辨认，不固执己见，努力择善而从，不间断地对自己已经获奖的著述进行修订。我从编辑出版的角度，向他提出，能否在这部严谨、素朴的志书中插入一些历史图片和重要的战斗示意图，增强其知识性、可读性，让内容更生动，形式更活泼，他也欣然采纳这一建议。可以说，近40年来，费侃如一直在以长征的精神进行着这部日志的撰写和修订。我们应当向他表示由衷的敬意。

《红一方面军长征日志》首先是一部史料性的著述，准确、全面是它的主要特点，为红军长征专题的研究、创作，提供了一份相当可靠的基础资料，使之具有了长征史研究必备的工具书功能，这是此书最大的价值。同时，由于这部日志是研究考据而来，其学术价值也受到了比较一致的肯定。“文似看山不喜平”，作者在日志的撰写中，还十分注意捕捉军旅征战中有意味的细节，在戎马倥偬之中，间或有平静生活写真，帮助人们更加立体地去认识长征、感受长征，使得日志也具有了丰富性、可读性。至为重要的是，整部日志，虽然客观性是不可或缺的最基本的要求，可是，字里行间，我们依然充分地感受得到作者对红军长征这一伟大事件的敬仰之心、歌颂之情。“历史学虽是发源于记录，而记录决不是历史。……我们研究历史的任务是：一、整理事实，寻找它的真确的证据；二、理解事实，寻出它的进步的真理”（李大钊语），作者正

是秉持着这样的史学观，去记录长征，理解长征，讴歌长征。

还应当肯定的是，东方出版中心的莫贵阳同志独具慧眼，及时发现这个富含修订出版价值的选题，认真配合作者进行修订，为了方便阅读和记忆，拟定了每则日志的小标题，收集、使用了大量有价值的图片，并且和他的同事们精心编校和设计版式，日以继夜加班制作，倾注了许多心血。终于，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一部更臻于完备、更为生动的《红一方面军长征日志》，以崭新面目出现在广大读者面前，做出了中国出版集团所属出版机构应有的贡献。

遵费侃如同志之嘱，为他的著述，也为纪念伟大的长征，写下以上感想，是为序。

2006年7月20日于北京

概述

1933年9月，国民党蒋介石在德、意、美等国的军事顾问参与策划下，纠集100万兵力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其中50万兵力用于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国民党政府军采用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术，于28日占领黎川。此时，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奥托·布劳恩）从上海来到瑞金。中共中央领导人秦邦宪（博古）和李德直接控制着对红军的指挥权，他们放弃过去几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先是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遇到挫折后又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1934年1月下旬到3月下旬，红军在许多战役、战斗中均遭失利。从4月中旬开始，国民党政府军集中兵力进攻广昌。秦邦宪、李德为了保卫广昌，调集红军主力与国民党政府军“决战”，结果不仅未能阻止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保住广昌，反而使中央苏区的反“围剿”形势急剧恶化。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作出决定，红军一方面军准备撤离苏区，并把这一计划向共产国际报告。随后，由秦邦宪、李德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组成三人团，负责“处理一切”。6月25日，共产国际复电指示：“动员新的武装力量，这在中区并未枯竭，红军各部队的抵抗力及后方环境等，亦未足使我们惊慌失措。至于说到对苏区主力红军退出的事情，这惟一的只是为了保存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根据这一指

示，中共中央开始着手退出苏区的直接准备。7月5日，中央书记处为宣传和推动全国的抗日运动，调动和牵制及减轻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压力，决定以七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由军团长寻淮洲，政治委员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和中央代表曾洪易率领，向闽浙赣边前进。

7月23日，中央书记处、军委决定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向湖南中部转移，与二军团（当时番号为红三军）取得联系。在中央代表、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弼时，军团长萧克，政治委员王震率领下，全军9000余人于8月7日踏上了西进的征途。六军团西征，不仅调动和分散了进攻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队，还为红一方面军主力实行战略大转移探索了路线。

从9月下旬开始，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了一系列准备突围西征的命令。9月21日，军委决定将新编二十一、二十二师合编为八军团，周昆任军团长，黄甦任政治委员。23日，中共中央机关、共青团中央和全国总工会联合发出：“加紧提高我们的军事学习，准备随时武装上前线杀敌人去！全苏区的机关赤卫军动员起来吧”的号召。当晚，三个机关的工作人员、赤卫军，进行了紧急集合演习。25日，军委致电各军团：一、“二十六日晨，蒋敌将向我发动总的攻击。李延年纵队将向汀州前进，陈诚的一路将向石城前进，其以后的目的，是占领我的中心项京（金），薛岳的一路和周浑元纵队近日亦在逐步前进，其目的是占领我们的兴国，从西面切断我的主力”；二、“各军团在二十六日晨以前，应有充分的战斗准备，在战斗以前，应进行最高度的政治工作，并解释此次战斗的重大意义”；三、作战开始后，“应很爱惜的使用自己的兵力，应坚决避免重大的损失，特别是干部”；四、在战斗“不利的条件下”，“应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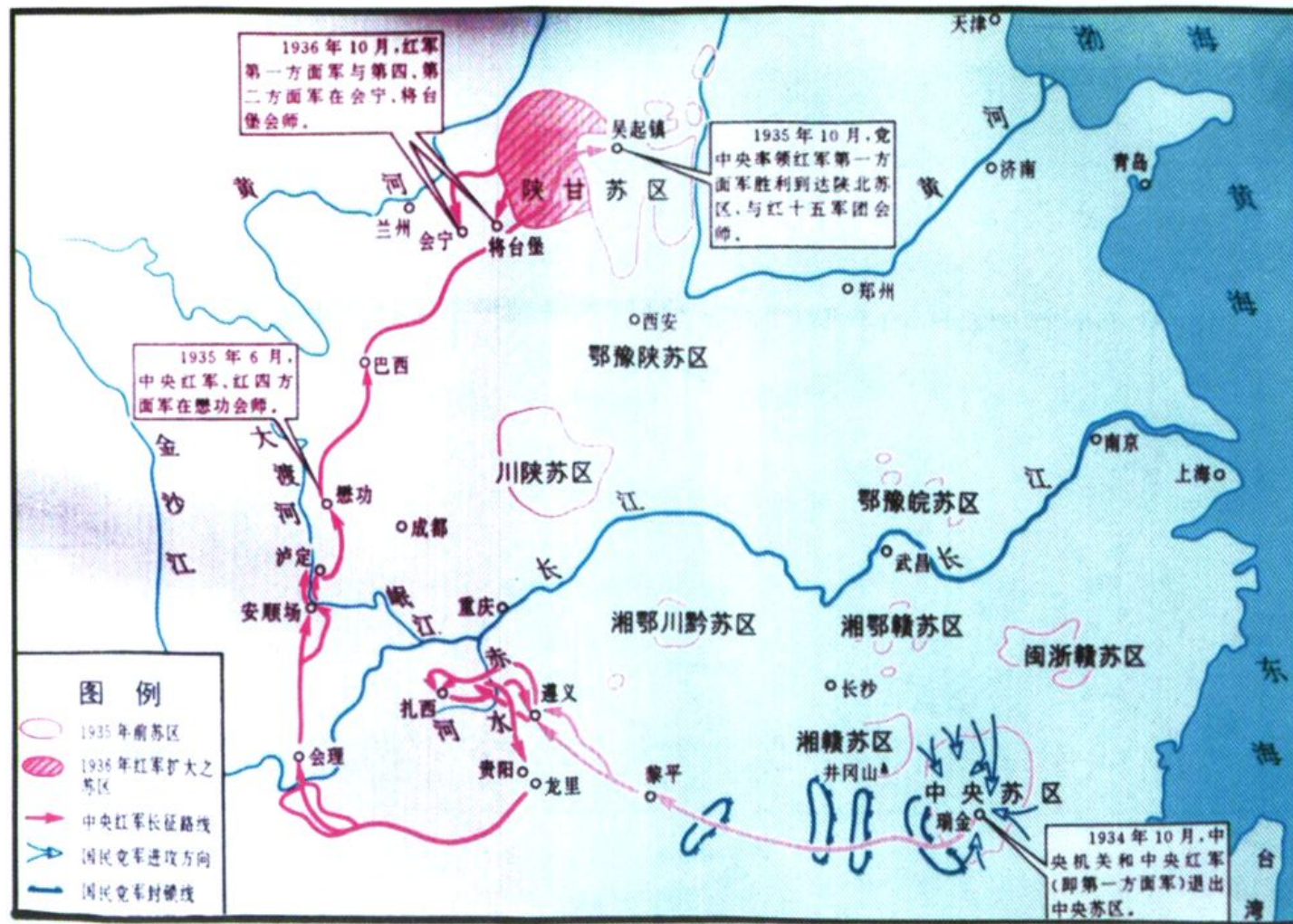
时放弃先头阵地”；五、在战斗“失利时，应有组织的退出战斗”，并要求各军团迅速报告战斗经过和结果，以便军委能“适时下达”“新的命令”。2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洛甫），在红色区域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第239期上发表《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署名社论，指出：“为了保卫苏区，粉碎五次‘围剿’，我们在苏区内部求得同敌人的主力决战，然而为了同样的目的，我们分出我们主力的一部分深入敌人的远后方，在那里发动广大的群众斗争，开展游击战斗，解除敌人的武装，创造新的红军主力与新的苏区……我们有时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迫之下，不能不暂时的放弃某些苏区与城市，缩短战线，集中力量，求得战术上的优势，以争取决战的胜利。”这一社论，实际上是红一方面军准备实行战略转移的第一个公开信号。10月3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联合在《红色中华》报发表《为发展群众的游击战争告全苏区民众》的文章，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准备战略大转移，开展游击战争的必要性。

从10月7日起到9日，一、三、八、九军团先后奉命将防御阵地移交给中央苏区的各地方独立团。中共中央还决定由项英、瞿秋白、陈毅、陈潭秋、贺昌等组成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中央军委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项英为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陈毅为办事处主任，统一领导中央苏区和闽浙赣苏区的红军和地方武装继续坚持斗争，并掩护主力红军突围。9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要求“加强部队的政治、军事训练，发扬部队的攻击精神，准备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进行长途行军与战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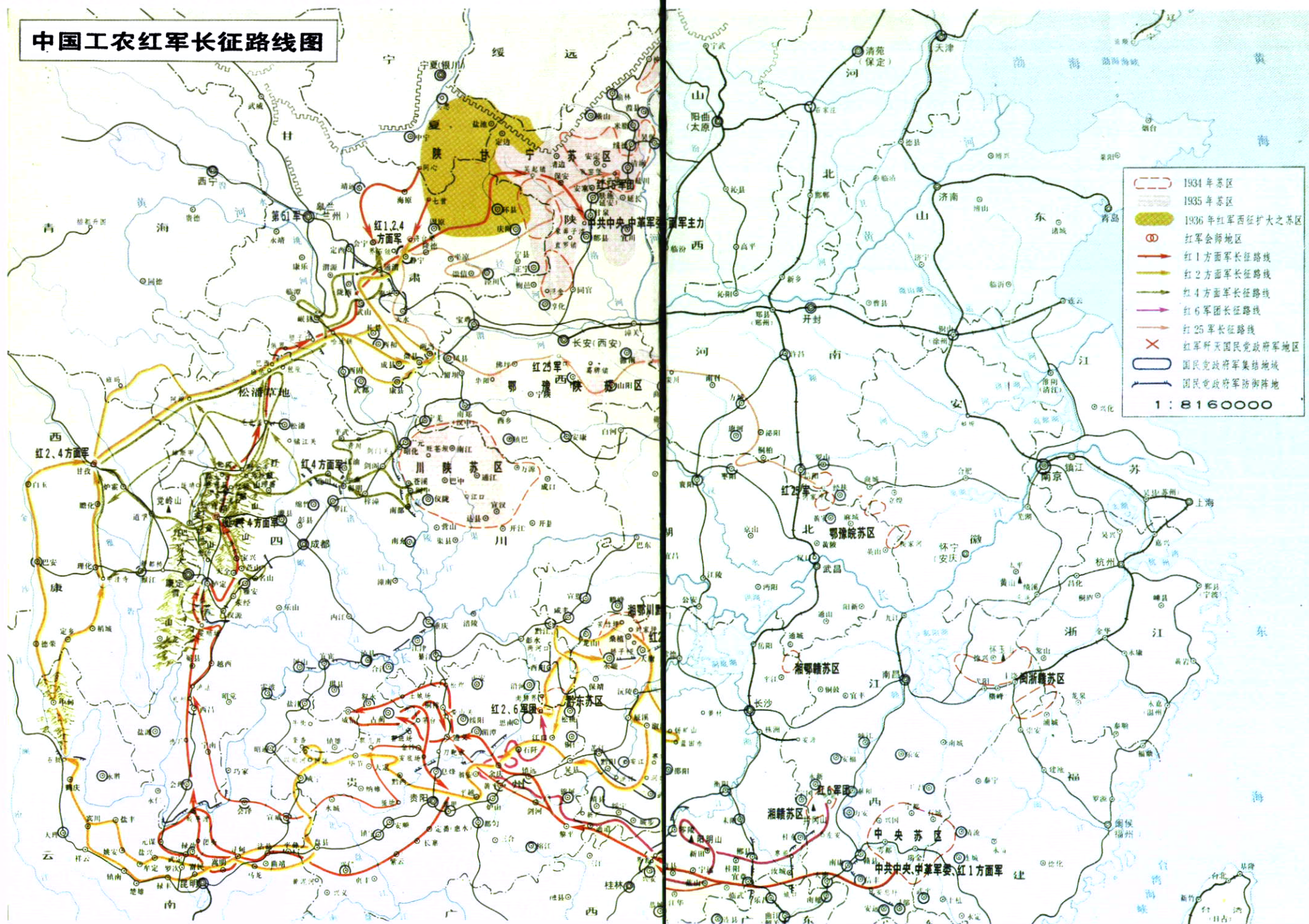
这时，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兴国、宁都、石城一线已相继失陷，

粉碎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完全丧失，尽管中共中央、军委在具体安排上做了非常细致周密的工作，但对于如此大的战略转移，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也不向广大指战员传达和进行政治动员，更没有在适当范围内向中央苏区的干部与群众进行宣传讲解，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秦邦宪、李德即决定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主力被迫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向湘西实行战略大转移，开始长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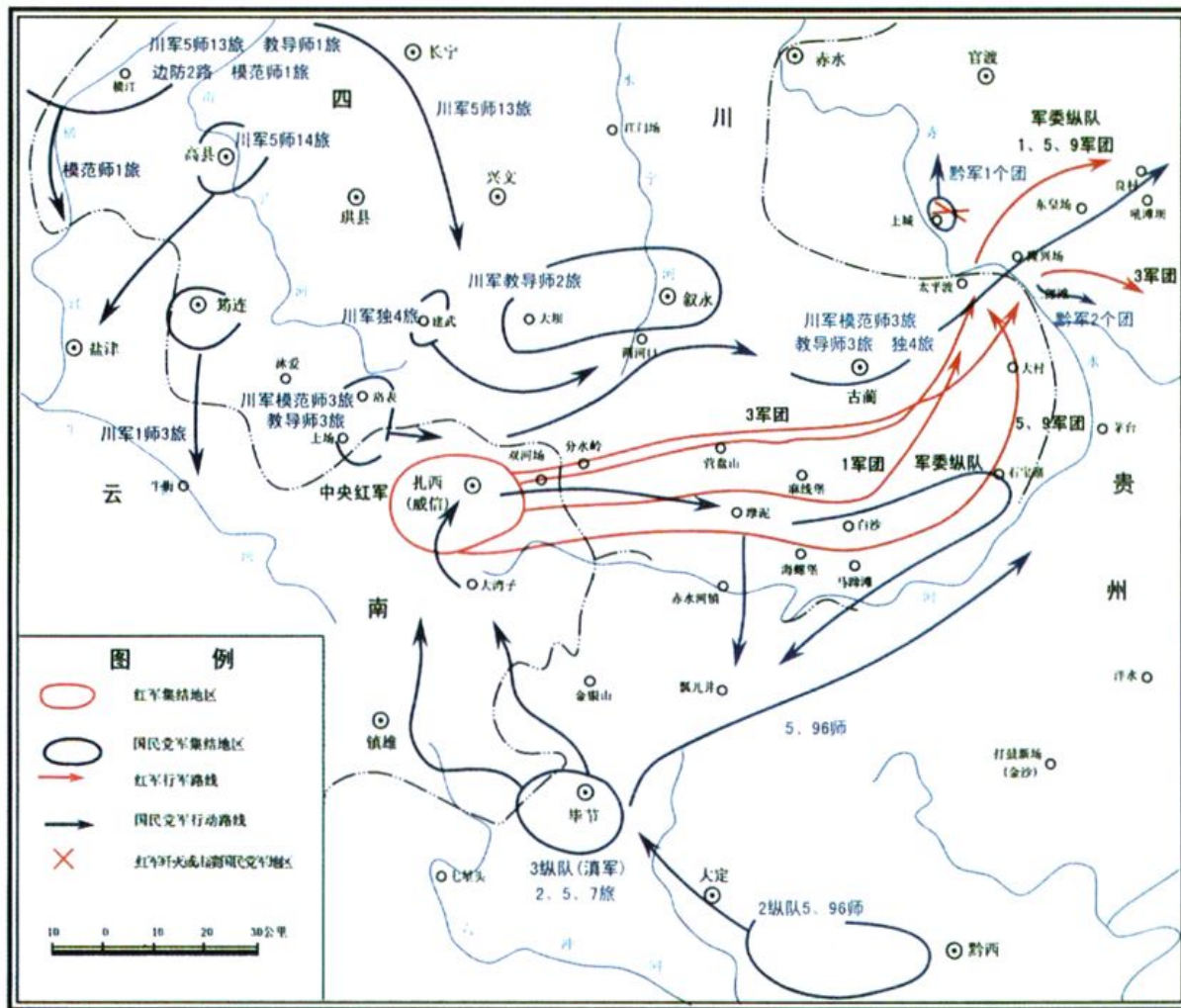
红一方面军长征路线示意图(1934.10~1935.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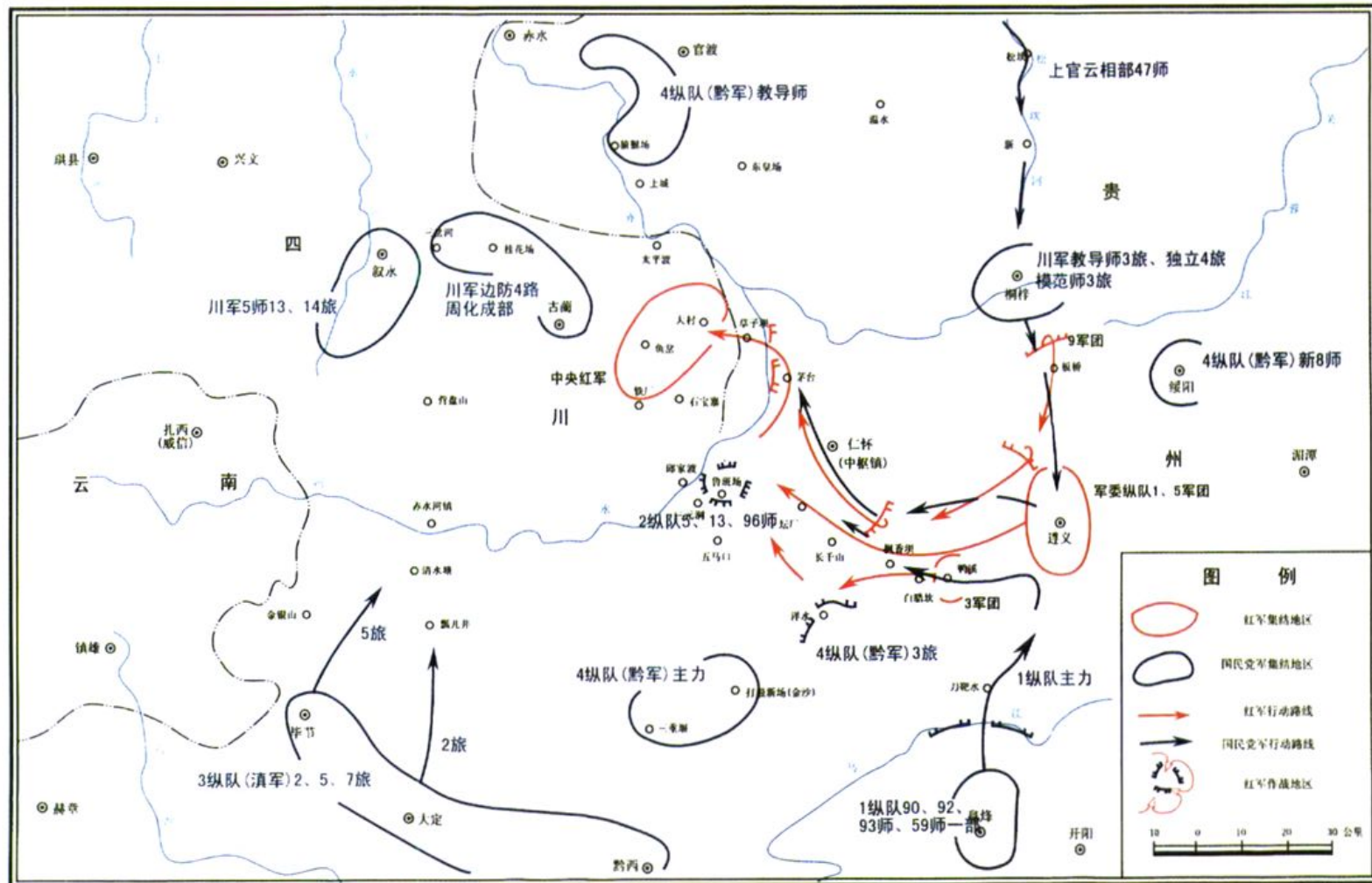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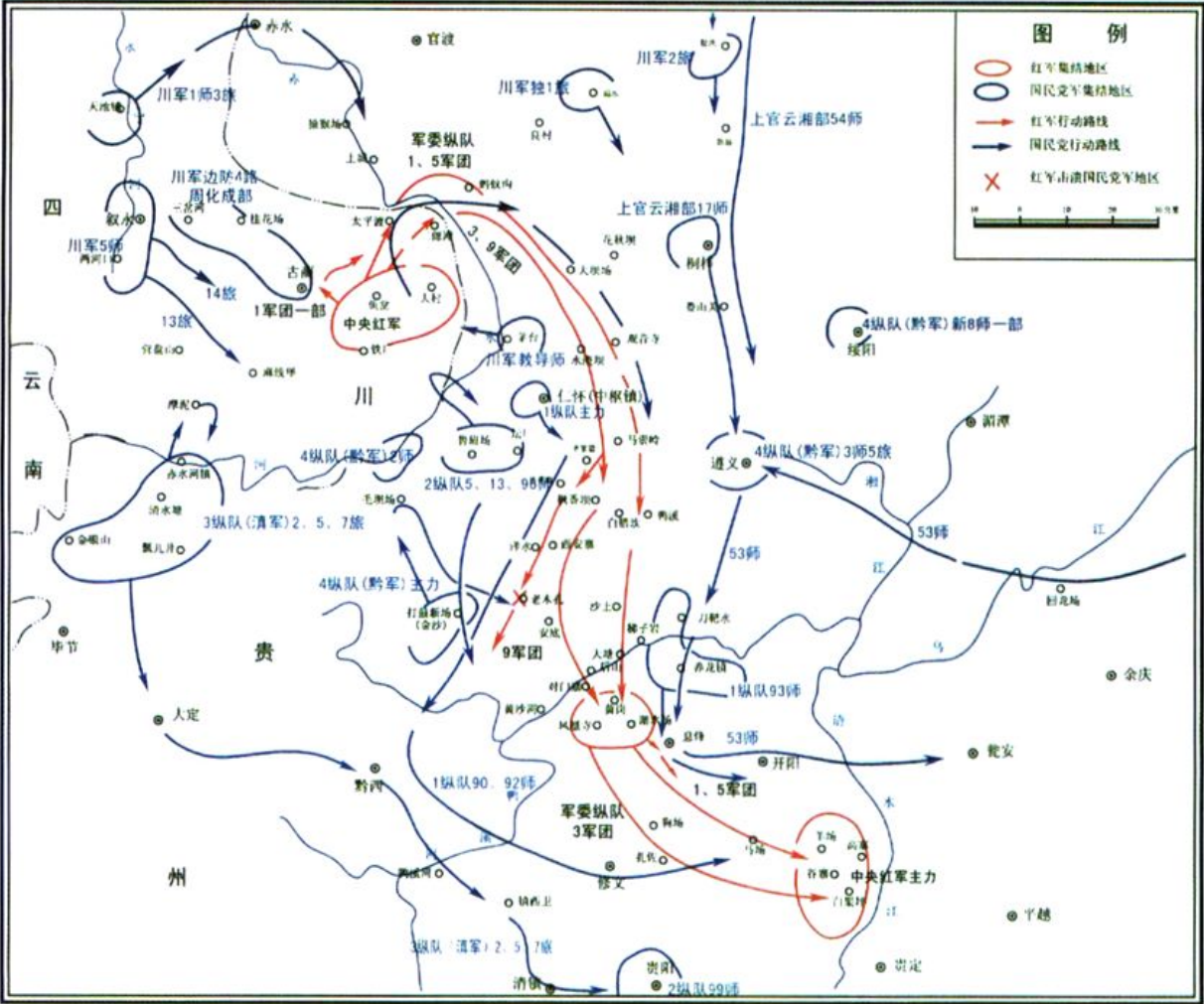
红军二 渡赤水河要图(1935 年 2 月 9 日~21 日)



红军三渡赤水河要图(1935年3月1日~19日)



红军四渡赤水河、南渡乌江要图(1935年3月20日~4月5日)



红军进军云南、抢渡金沙江要图(1935年4月2日~1935年5月9日)

